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流动中的社会网络建构^①

陈佩儿¹，黄晓星²

(1. 香港岭南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香港 999077；2. 中山大学 城市社会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275)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过程中在流出地（内地城市）和流入地（香港）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详细呈现了其在流动中构建社会网络的整个动态过程。研究发现，来港初期，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依靠同辈、亲人和自我建构的社会网络远距离地建立起在港的社会网络；但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工作圈与生活圈出现断裂时，没有共同经历的业缘关系难以建立，原有共同经历的地缘关系也因流动而难以坚守，最后反倒愈发依赖稳定的家庭关系。在后期流动的过程中，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逐渐呈现一个松散且萎缩的局面。无论是流动资本还是社会网络显然都难以在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过程中完成积累和扩张。

关键字：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流动；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1999年，香港政府放宽了非本地学生来港就读的入境政策，让内地生来港就读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2001年，颁布了“在本地院校取得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的内地学生来港就业安排”；2008年更是进一步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允许内地来港毕业生即使在没有获得工作的情况下仍可留港12个月。随着种种逗留条件限制的放宽，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士选择来港就读及工作。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在政策推出10年间，累计超过16万内地人士到香港读书及工作。单单过去2017年一年间，香港向内地人发出签证便有学生1.89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1.39万、“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9289个，保守估计每年起码有4万内地人来港居住^②。这一在港府放宽来港就读和工作限制的政策下，漂至香港的内地年轻群体，被冠以“港漂”之名^③。

随着“港漂群体”不断扩大，碍于文化和制度差异等因素，社交圈子较窄（主要同为内地人）、难以融入香港本地主流等论述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这一“社交圈子太窄，且本地朋友不多”的问题甚至成为港漂内地人在港发展的弱点（黎黄霭玲等，2014）。

在目前大众和媒体传播中，“港漂”时常以一个集体性名词出现，但其实所谓的“港漂

^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港澳本土意识与青少年的国家认同”（16JJDGAT004）。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流动中的社会网络建构

作者：陈佩儿，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黄晓星，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通讯作者：黄晓星，huangxiaoxing@hotmail.com

^②资料来源：香港入境处（2017），数据资料，<https://www.immd.gov.hk/hks/facts/naturalisation-nationality.html>。

^③ 在2010年《明报周刊》的封面主题故事“80后港漂”中，首次将近10年间在港府放宽就读和工作政策下来港读书和工作的内地年轻群体称为“港漂”。

群体”，难以被简单化为一个整体看待。就现时来港就读和工作政策下，就可简单划分成通过学生签证来港修读学士或硕士学位课程的学生群体；后续在“在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政策下选择留港就业的内地人士；通过工作签证来港就业的内地人士，等等。因其异质性，作者认为“港漂群体”应该被看作一个有待拆解的社会建构群体，但碍于各种原因，学术上仍缺少对该群体的解构性讨论（这亦非本研究关注重点，不便多加论述）。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对象——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特指通过学生签证来港就读硕士学位课程后，选择留港工作且居港未满7年的内地人士。作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第一，硕士学位课程（分为授课型和学术型）时间一般较短，多为一至两年时间，且修读该课程的学生多为内地学生，在流动前期较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在港内地学生圈；其次，课程结束后，内地毕业生或会选择到海外或回内地升学/就业，这意味着选择留港工作的内地毕业生的关系链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再者，现时留港未足7年的内地人士^①，更符合“漂泊”的定义，体现出较高的流动性。显然，在整个流动过程中，随着职业身份的转变，该群体的社会网络亦将呈现出一个更为多样的动态变化。

以下一段记录摘自于受访者 Huang 的访谈记录，她的回答说明了在流动过程中“漂”的感受和对在港两地社交圈子的看法：

家人朋友在内地，自己在这边工作，就不是整个生活都在香港，而是处于一个 shuttle（穿梭）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点漂泊的意味……在香港你就一个人了，除了工作回到家里也是一个人，你没有什么其他依靠吧……然后回到家（内地），你有很多这种团聚的时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真实的生活状态吧……（Huang, 26岁，助理研究主任）

留港工作后的内地人士，多数情况下独自在港工作，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留在内地，经常回去内地享受团聚的时光，逐渐形成了香港——内地两地不断往返的局面。所谓的“漂”正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所呈现出的于两地不停流动的状态。在这流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依附于内地这一地理位置的社交圈（如家人亲戚、朋友）并没有随之进行移动；另一方面，在新的流入地香港中除去工作圈外亦难以形成新的社交圈，导致出现了因由流动而带来的社交圈的断裂。换句话说，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不但没有因为在两地的来回走动而扩大，反倒出现了明显的区隔。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一流动的过程中，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两地之间的社会网络是否真的无法进行连接与共享？为了更好地把握该群体在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笔者在2018年间对9位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留港工作人士进行深度访谈（访谈者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了解其来港动机、留港生活及未来流动去向等，分析在不同时期其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即将该群体的社会网络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过程中如何建构并维持其社会网络？同时，建构或维持后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下一阶段网络的变化？

表 1. 港漂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① 根据《入境条例》，通常居住于香港连续7年或以上的中国公民将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居留权，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受访者	年龄	性别	职业	教育程度	在港逗留时长/年
Huang	26	女	助理研究主任	硕士	4
Yu	27	男	银行程序员	硕士	4
Frank	28	男	研究助理	硕士	2
Jiawei	27	女	社工	硕士	4
Pan	29	男	研究助理	博士在读	5
Wang	29	女	采购经理	硕士	5
Wenbo	27	女	幼教	硕士	4
Yewen	28	女	中学教师	硕士	6
Xiao	25	男	财富管理员	硕士	4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社会网络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和群体间的关系（王春光，2000），在流动过程中，则指流动者通过亲属、同乡或朋友等关系与流出地居民和流入地居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的总和（Massey et al., 1993:448）。大部分研究均表明，社会网络对国际国内流动者的流动和社会融合起着关键作用（Frank, 2011; Lubbers, et al., 2007; Meng, 2000; 悦中山等, 2011; 张文宏, 2011）。特别是当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很大或流入地社会对流动者极不友善时，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网络可大大降低其流动成本和风险（Zhao, 2003）。

华人社会是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李银河，1995），相较于在职场上建立的业缘关系，在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影响下，中国流动群体更依赖于既有的强关系行动。诚然，在现有针对中国无论境内（如农民工的流动）还是境外（如“巴黎温州人”）流动的研究中，都可以发现，族人和同辈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在他/她的流动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为其流动、非法存在、就业和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更摆脱了原有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等限制（李培林，1996; 王春光，2000）。所以说，目前大部分有关流动群体的研究都倾向表达，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流动群体提供了流动的动力和生存保障，抵达流入地后，借助原初级社会网络，再建构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社会网络（曹子玮，2002），以适应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变化的变化，其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面得到极大的拓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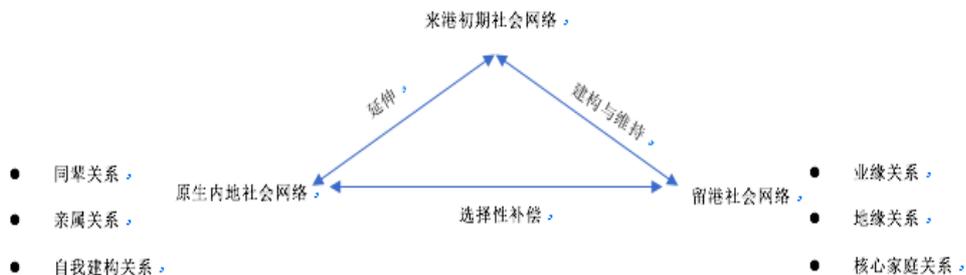
但不能忽视的是，该群体所呈现出的群体属性。可以发现，在上述研究中的群体具有明确的流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摆脱原生地社经地位上的落后，企图在流入地找到较为高薪的工作，以改变个人以及原生家庭的生活状态（寄钱回老家）（郭云南、姚洋，2013）。其次，他/她们还普遍面临着制度性的歧视和社会污名化的困境，如巴黎温州人的非法流动，正是在这社会制度并不完善或无法提供帮助情况下，依靠和构建社会网络成为其生存和发展技巧

(吴惠芳, 饶静, 2010), 同时, 建立非乡土的社会网络也有利于他/她们提高对迁入地生活的满意度, 更好融入当地 (齐心, 2007)。

在这里, 我们不禁要思考, 上述借助社会网络进行流动的模式是否同样适合用来分析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轨迹及其社会网络建构呢? 与大部分被研究的农民工或跨国移民者的群体属性不同: 首先,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是在香港政府政策下通过学生签证合法进入香港, 享有作为香港居民的权利; 其次, 该群体属于“带资”进港, 在申请签证时, 就已经提供了符合资格的财产证明; 再者, 他/她们选择来港读书时, 较多出于“离家近”、“教育比内地国际化”和“课程时间短”等原因, 且并没有作出后续留港的计划。所以说, 本身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异地的流动动机是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以及随机性, 且因自身社经条件较优, 社会网络对其流动的驱动或支持远低于上述群体。

流动性迁移^① (liquid migration) 是 Engbersen et al. (2009) 基于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 下提出, 指在频繁的流动下, 原本厚重而稳定的社会制度 (如阶级、家庭、社区和国家等) 正转变为更加灵活、薄弱的制度或组织。该流动性迁移具有六大显著的特征: 国外逗留的临时性质; 劳务移动 (含移民学生); 合法移民身份; 多重性和多方位流动; 个性化的生活策略 (典型的第一代流动模式) 以及不可预测性 (没有明确的迁移愿望和开放选择)。与传统的流动者一直被嵌入家庭、社区、当地劳动市场和国家的模式不同, 该流动群体有更多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流动性轨迹 (Engbersen, 2012)。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一个性化的流动过程中, 家庭作为流动引擎的主导地位将不断被削弱 (Philips & Massey, 1999)。也就是说,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凭借着合法的流动身份, 因着自身流动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等, 将享有有更多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流动轨迹和社会网络; 同时, 这意味着该群体的流动轨迹和社会网络更加个人化。

而目前有关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中如何实现社会网络建构的研究却尚未引起学术研究的注意, 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另外, 可以留意到, 目前针对流动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的建构, 往往是流出地对流入地单向性的影响, 缺乏以一个动态的视角去观察, 其流动前后, 无论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的社会网络的整个变化过程。因此, 对于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维持, 我们需要纳入更为动态且全面的视角, 关注从流出地到流入地原有的社会网络的延续和新型社会网络的建构过程。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三.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社会网络在港的动态变化

^① 中文为作者译, 请以英文为准。

（一）内地社会网络在来港初期的延伸

为了适应周围环境，个人将会对不同的资源有选择性地利用，从而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策略模式：依赖同辈的模式，即运用同辈及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资源；依赖族人的模式，即利用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资源；依赖自己的模式，则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非人情关系的组织资源（G&G, 1977），通过不同模式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成为他/她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廖正宏, 1986:10）。

在来港前，大部分港漂受访者表示已积极通过自身在内地的社会网络提前获取在港的相关资讯，并尝试远距离地初步建立在港的社会网络。而因其进入香港的行动具有很高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社会网络的功能在初期往往以提供信息、情感支撑为主。

1. 借助同辈及相关社会背景的人的社会网络进行网络对接

在确定来港就读后，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会主动寻求与相关人士（已在港的同学、学长学姐、或曾有留港经历的在校老师等）等进行接触，提前获取在港与学业和生活相关的资讯。此时，关系链主要是用来传递流动信息以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社会资源为自己提供服务，为之后来港的生活做准备。

高中我们是同班但不熟，后来我要过来（香港）读书，我们两个就开始联系……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住在一起。就连我后面（留港工作后）在香港的社交圈子都是她从她开始的。（Wenbo, 27岁，幼教）

从 Wenbo 的访谈记录中可以看出，在来港就读前，她就已经尝试通过自己内地的社会网络找到在港的关键人物（高中同学），与其重新恢复联系，并借由利用对方已在港的资源，提前解决了在港需要面对的问题（如租房子），更为来港后在港的社会网络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原家乡，双方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基于“香港”这一特殊的中介，所有与香港相关的信息成为了双方的共同话题，已经出现断裂的联系重新被连接在一起；同时，即将聚居在同一异地的经历，也让双方有更多在地的交往机会。也就是说，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早期尝试性远距离建立在港社会网络时，亦不断借由“漂泊”香港这一共同经历加深了原有在内地既有的社会网络，可以说这一社会网络既是原有内地社会网络在港的延伸，同时也是内地社会网络本身的扩张。不仅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范围远远超过了原有关系的地理范围，连其强度也在不断增强，变得更加紧密。

2. 依靠在港亲戚的社会网络初步建构在港个人社会网络

随着两地人们交往的频繁，跨境婚姻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跨境婚姻中的内地一方也成为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无论是来港前还是来港后重要的支持者。在开始其港漂经历前，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会透过与在港亲戚的往来，采取来港探亲等方式提前体验在港生活，亲身获取对香港的第一手资料，后续更经由亲戚这一关键人物初步建立在港的个人社会网络。

姑姑早年就通过婚姻来港的 Pan（29岁，博士在读）表示，“之前就来过（香港）一次找我姑姑……一开始可能觉得我比较需要帮助，她就会经常叫我去她家吃饭，问我学习呀生活适应不适应。有时候还会让她的同事帮我带一点吃的……”。在港亲戚居港时间较长，且一前一后的时间差能让他/她逐渐摸索出适应香港本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也让其建构起较为稳定且覆盖面较广的在地社会网络（依附于婚姻关系），能够成为一个较好的资源提供者。而且，华人较注重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对家族内具有血亲关系的成员具有较强的义务

和责任。所以，当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独立离开家乡前往异地生活时，出于“血浓于水”的宗族责任，在港亲戚在前期时会慷慨提供帮助（以经济照顾、情感支持、讯息传递为主）。这样，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他/她们在港的初期生活体验、流动资讯以及情感沟通等活动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支持，且可以实现地域的跨越，同时成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初期的社会支持网络。

3. 通过社会组织等自发性结伴，在港内地圈的雏形初现

跟上述提及的两种提前找到在港的关键人物，利用其原有的社会网络拓展自己在港社会网络不同，这一种模式主要依靠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自己主动在港漂圈、寄托等专门服务于“港漂群体”的社会组织内寻求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内地人士，在内地率先建立好同质性较强的内地朋友圈。在随后的流动中，将整个内地已建构起的社会网络直接迁移到香港，后落地。

我在寄托（某港漂网站）上面会发帖，告诉大家我是什么专业，然后有人看到你的帖子，就拉群。有一些小伙伴还是因为建群之后，群里认识的，就一起在香港找房子……（Wang, 29岁，采购经理）

这模式主要是通过扩大自身内地的社会网络，将一群同样没有在香港有生活和工作背景在即将要有共同体验的内地人士聚集起来。这群人往往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彼此之间的线上互动形成一个巨大的、跨越地理范围的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会随着流动者的流动实现异地转移，而这其实就是在港内地圈的雏形，即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第一次抱团。

通过比较上述三种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前两种模式，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所建构的社会网络呈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主要依靠在港的关键人物为其流动提供资讯帮助。这一单向性的依附模式会使得他/她们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讨好或维系双方的关系，以确保能够得到后续稳定的支持。比如 Huang（26岁，研究助理主任）就提到由于觉得拜托了在港亲戚对自己女儿提供帮助而感到亏欠，她爸爸会时不时就请对方吃饭，逢年过节也会送礼品来表达自己的谢意，以确保关系的延续性。但这种依附型的关系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当物质感谢或原有的情感基础无法发挥维系关系的功能时，便会产生令受访者也无法理解的“断交”。正如 Pan 谈及与在港姑姑后期关系破裂时，说道“她好像就是觉得我已经独立了，不需要她（帮助）。可能我哪些地方让她生气了也不一定。反正她现在对我态度很冷淡，我去送她东西她都不接待”。之后甚至连他爸爸（亦亲戚的亲哥哥）前往拜访时，姑姑亦推脱工作忙碌不方便碰面。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亲戚关系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和作用似乎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减弱的势头。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弱化原有的亲戚关系，这种单方依赖型的关系也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居港时间越长，摸索出属于适合自己的在港生活和工作模式后逐渐减弱。一方面，在港亲戚认为在港初期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帮助，留港工作的内地人士在找到工作后可以在香港自给自足，便主动停掉了原有的支持，减少双方之间的往来。另一方面，基于长辈对晚辈照顾而建立起来的依赖型关系，双方本身就处于一个地位不对等的状态下，在前期，当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香港并不熟悉时，亲戚的主导性确实可以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本身对香港也逐渐了解的情况下，亲戚的主导型反而限制了他/她的自我发展。加之，双方之间往往没有重要的共同经历作为后续支撑，亲戚作为一个资讯提供者和情感支持者的角色在流动过程中逐渐被淡化，在港的亲缘社会网络也自然而然随之减弱。由于在港的亲戚社会网络正是内地的亲戚社会网络的延伸，所以当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与亲戚之间的关系出现破裂时，这一破裂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内地既有父辈间的亲缘关系网络。

通过自发性组织所建构的互助型网络,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平等互助性。首先,他/她们通常都是自发地带着希望能找到自己同校或同专业的内地学生为目的,会在平台发帖建群等。在这过程中,群内成员会主动分享自己所了解到的资讯,如在港的衣食住行、学校课程的安排、各种入学手续等,通过线上互动实现信息的共享,以维持群内的活跃度和联系。除去实质的资讯互助外,情感支持也是影响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主动选择“抱团”的重要原因之一,即通过同一的学生身份以及即将在港开展异乡生活的共同经历让他/她们得以产生“同为异乡人”情感联系。这一情感共鸣产生了对“共同体”这一集体性概念的体认,大大增强了群体间的凝聚力。显然,与前两种模式体现的单一性不同,互助型的社会网络呈现出群体性的特点,不存在所谓的关键人物,覆盖面更广且更为发散。即使在后续流动中,同样也面临着不断筛选与重组的过程,但是多重交叉的网络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在港工作内地人士所获得社会支持的多样性。同时,自发性结伴所产生出的集体认同度,使得多方能形成良好的互动,这一平等互助的关系也得以在后续共同留港的经历中不断加深。

总而言之,来港前,留港工作内地人士通过多种方式尝试性远程建立其在港的社会网络,并且在构建的同时也不断拓展了自身的内地圈子。当然,通过不同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如依赖型和互助型,在后续建构和维持中亦出现了不一样的反应:有破裂、有延续和有加深,反过来也影响了后续在港的社会网络。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从覆盖面而言达到其最大值。

(二) 在港期间个体社会网络的重构

毕业后是否留港是每个在港就读的内地生在港期间面临的重要选择之一。对大部分选择留港工作继续港漂生活的人来说,留港的随机性很大:他/她们并没在来港初期就做好留港工作的规划,反而是在找工作过程中,比较了内地和香港的工作机会而作出的选择。另外,在港府“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的政策下,非本地毕业生在课程结束后享有12个月在香港继续逗留的权利,给予了较大的自由摸索空间。所以,留港工作对大部分受访者具有较强的体验意味,不管之后是否继续留港,回内地发展也是一个备选,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但在这一进一退下,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的社会网络却面临着重构的危机。

1. 业缘关系难建,流动的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难续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中资企业,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内地人且工作业务多为面向内地市场,所以在工作环境下与香港本地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主动倾向中资企业,而是碍于语言、文化等问题,他/她们在招聘过程中难以突围而出。Wang在找工作的时候,无论是港资还是中资企业,她都有递交简历,只是“港资的话,其实是面完group discussion(小组讨论)就没了。那时候(面试)用了广东话,我只能听懂,很怕回答,所以没有办法参加讨论”。所以她之后选择留在了一家在港的中资企业,日常互动的以内地同事/客户为主。但即使有香港同事,Pan认为“香港的跟我们(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是两个圈子”。语言上的障碍是大部分受访者反复提及的,这一背后代表的是无法共享的文化,而这一文化又与共同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因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与香港本地同事缺乏共同成长的背景,比如对热点话题、网络用词等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达成一致,无法找到双方共同点作为交往的切入点,渐渐仅保留依附在“工作”上的联系。

而且这一基于工作场域形成的弱关系,一旦脱离了这一特定的工作场域(如换工作),不管是否离开香港这一地理范畴,都将难以持续,这也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所能预见的结果。正如Frank(28岁,研究助理)认为“工作聊完,就没什么其他的……和我现在的同事(香

港同事),我们俩以后肯定没有联系,我现在就可以预测……所以,将来可以帮助你朋友,能和你聊天的朋友,就相对那么少。离开以后可能没有,因为我跟香港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联系。一旦没有这个机会,那就没有这个基础。想(以后)见面,就比较难”。

显然,缺乏与本地同事的良好互动,无论是双方的生活圈还是工作圈都出现了明显的区隔,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香港工作的状态呈现出“寄居”的现象,即他/她们仅仅是生活在香港这一地理范围内,但是其生活和工作模式并没有适应社会和环境的变化,难以完成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次级社会网络的建构与在地化。

那么留港后的内地圈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线上线下联动的互动模式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得以维系其在港的内地社会网络的重要方法之一。碍于香港盛行的“加班文化”以及非聚居的生活模式,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工作日很少有机会可以相聚,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线上聊天软件进行日常互动,如微信聊天、朋友圈点赞留言等已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当线上的互动是为了维持日常稳定的交往以保障关系的连续性,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则是让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有一点无法忽视的便是,在港建构的内地社会网络的核心组成人物正是同具有高流动性的内地人士。他/她们本身是因“流动”的异乡人身份而结交成友,同时,也会因“流动”而四处分散。特别是在流动过程中,原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因各种原因回内地或离开去别的国家发展时,缺少在同一地理环境内持续性的线上线下互动,原有较强的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也面临着瓦解的危机。

我的内地圈的朋友是流动的,有人走,也有人会进来我的圈子。通常都是因为工作离开香港的,(离开之后)这辈子就见不到啊……如果你们离开了香港,地理因素是一个很大的东西(Yu, 27岁,程序员)。

在港的内地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是由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本身的高流动特性所决定的。但当放置在香港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它却相比起其他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和业缘关系),显得较为稳定且成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重要社会支持来源之一。逃不掉,如同业缘关系般,一旦脱离香港这一场域,这依靠“异乡人”这一共同经历的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连接起的社会网络也随之变得分散疏离,渐渐失去其情感支持的作用。

同样地,就连原有的内地朋友也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双方互动不断减少。选择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的投入,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区隔等,使得双方也难以产生共同话题,无论是线上的日常聊天还是线下的聚会都呈下降趋势,或有选择性将资源投放在小部分值得投资的朋友身上(如儿时玩伴或原交往密切程度较高的朋友)。

所以,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留港后,没有共同经历的业缘关系网络难以建构,即使是有共同经历的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网络也难以在流动中维持,其整体社会网络呈现出不断萎缩且松散的状态。

2. 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增强性依赖与补偿

虽诚如 Engbersen 认为在流动性迁移中,家庭作为流动引擎的主导地位在下降。但我们发现,在家庭本位文化影响下,家庭依旧在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比起其他关系,他/她们在家庭这一原本就较强的关系上反倒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对其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比如来自广东的港漂 Huang 她表示在读书期间基本都是寒暑假才回家,但是工作之后她基本上两个星期就会回一趟家;即使家在云南的 Wenbo 也表示一有假期,即使两三天她也会选择飞回家与父母相聚,或者抽空和父母一起外出旅游。

留港内地人士对家庭关系的倾向式投入主要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这是出于减轻因

异地工作和生活无法照顾父母所产生的愧疚感而做出的补偿性措施。Wenbo 解释到，“就自己心里面有一点觉得，老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还是要回去陪一下。就是中秋这些团圆的节日，有一个对比，你才会觉得，陪不到他们自己心里也挺难受的”。除去面对面的相处外，他/她们同时也会通过各种社交软件保持线上的互动频率，展示自己在异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确保双方在情感和信息上的互通。第二，在整个流动过程中，因维持不同的社会网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成本投入是具有选择性的。在面对预期中难以建构与维持的业缘关系网络、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网络，他/她们亦会主动将资源集中投放在可控的关系上，不断稳固自身的社会网络以寻求稳定的社会支持，以抵抗流动中的不安。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在流动的不稳定状态中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稳定和补充作用，尤其是给予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稳定的情感性帮助。

这样，无论是流动前还是流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如地缘关系、友谊关系等）伴随着高流动性和不明确性而不断式微，家庭关系这一强关系却得到不断的强化。相比起来港前期社会网络覆盖面广，在港后的社会网络在流动中出现了越发松散且不断萎缩的状况。

四. 结论与讨论

“香港工作，内地生活”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其目前港漂状态的一个整体性描述。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生活的个人化以及留港与离港预期的不明朗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性。这一不断增强的流动性正正使得在港后的社会网络难以建立于维持。显然，与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相比，流动中的社会网络转型显得更加延迟和艰难。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生活的个人化。首先，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超长工作时长使得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生活单一化。根据瑞银集团 2016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超过 50 个小时，每年工作约 2,600 个小时，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城市^①，工作日繁重的工作任务以及无休止的加班早已使他/她们筋疲力尽。因此，在个人休闲时间中他/她们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切断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也就切断了与本地同事或港漂同事的联系，以个人活动为主。如若已在港成立家庭，回归自己的小家庭活动也成为首选，而较少参与以建立或维系在地社会网络的集体活动。同样，香港本地同事也倾向选择以个人为主的家庭活动。李沛良等（2001）针对香港和北京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尽管这两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市场化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核心家庭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在社会网络中均显示出极端重要。也就是说，不仅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融不进”，本地港圈的封闭性也对其融入产生了一定的排斥作用。

在传统的流动群体中，无论是巴黎温州人还是新加坡小印度群体，均产生了聚居或聚集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网络不单影响了他/她们异地的进入，还影响了其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聚居或聚集更有利于充分借用社会网络来完成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对留港工作的内地人士来说，这一关系链的重要性较弱，难以在港形成较强的集体凝聚效应，内部联系相应地较为松散。再者，留港工作的内地人士主要依赖稳定的工作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因此通过建构在地社会网络来达致融入的目的，对他/她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看重的问题：“我干嘛要融入啊，我不 care（在意）这个问题，我反正就上班，上完了我就回家，我又不需要跟那些香港人打交道……工作岗位足够维持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生活”（Xiao, 25 岁，金融行业）。确实，在所有的受访者当中，仅有两名受访者分别表示在居港 4 年和 6 年的时间内，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百家号。内地人才在香港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20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6313511322301313&wfr=spider&for=pc>

曾主动换过一次工作,其余均未从更换工作单位。也就是说,维持在港工作和生活更多依赖于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不是社会网络。最后,比邻深圳、珠海等内地沿海城市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工作和生活圈子的分开提供了可行性。借由便捷的交通和过关程序,随时可回内地过回熟悉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港发展出合适的生活方式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另外,留港和离港也成为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特别是对于在港工作生活2至6年的内地人士,也就是本次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续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大部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后续是否留港都是持有观望的态度,这取决于香港与内地两地不断变化的发展前景。尤其随着内地薪酬待遇和物质生活等要素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香港原有的优势逐渐丧失,难以吸引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落地生根。反观,内地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人才优惠政策,吸引在海内外有留学背景的学生回流。如在2017年,深圳市就打响了“人才战争”,制定“促进人才优先发展81条”等,加大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的资助力度,甚至对人才给予租房和生活补贴等各种优惠^①。加之,大湾区的建设也让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有机会成为这种多个城市功能互补的生活的优先体验者,为其提供了暂时立足港土,眺望神州的观望机会。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是一个着重“机会”的群体,来去均随“机”而动,这一机会的随机性也增强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性。

借助便捷的交通设施、通讯工具和宽松的出入境政策等,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能轻易跨越时空的限制,实现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的分离式满足,也让我们对自身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维护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实现社会网络在地化的动机较弱。但我们会发现,当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工作圈和生活圈出现隔离时,难以形成不同群体间的共同经历,意味着其生活和工作模式更加原子化,流动轨迹更加个人化其社会网络更加松散和萎缩。这一互斥型的流动的社会网络将导致他/她们难以实现流动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反倒愈发依赖于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资本,也就是并没有实现借由流动过程不断扩大其社会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以跳出原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目标。那么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作为沟通香港内地两地桥梁的角色或进行两地资源交换的目标更是难以实现。另外,可以试想,如果在港工作仅作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短暂的人生体验式旅程,这对香港来说无疑造成了大量优质人才的流失。同样,即使在面对内地众多人才优惠政策,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却是“回不去”,既有内地社会网络也因流动不断缩小,亦对内地的工作环境产生不适,而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逐渐在流动中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因此,如何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现有高流动性的特性去劣化,转劣为优,即重新发掘其高流动性对社会网络建构与维护的积极功能显得尤其重要,而这亦是之后的研究可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Engbersen, G. (2012). *Migration transitions in an era of liquid migration Reflections on Fassmann and Reeger*. na.
- [2] Engbersen, G., Snel, E., & de Boom, J. (2009). A Van full of Poles: Liquid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 Europe,(w) R. *Black i in.(red.) A Continent Moving West*.
- [3] Graves, N. B., & Graves, T. D. (1977). Preferred adaptive strategie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New Zealand's multi-cultural workforc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3)

^① 资料来源:引智中国。“人才战争”打响!2017深圳出台史上最优政策一次性吸引了72个国家,2017.
<https://470098.kuaizhan.com/50/66/p42385782300bf2>.

- [4] Kalter, F.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ynamics of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from Poland to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5), 555-569.
- [5] Lubbers, M. J., Molina, J. L., & McCarty, C. (2007). Person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s: the case of migrants in Spa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2(6), 721-741.
- [6] Massey, D. S., Arango, J., Hugo, G., Kouaouci, A., Pellegrino, A., & Taylor, J. E.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31-466.
- [7] Meng, X. (2000). *Labour market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Phillips, J. A., & Massey, D. S. (1999). The new labor market: Immigrants and wages after IRCA. *Demography*, 36(2), 233-246.
- [9] Zhao, Y.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1(4), 500-511.
- [10] 曹子玮. (2003).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 *社会学研究*, 3, 99-110
- [11] 郭云南, 姚洋. (2013).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管理世界*, (3), 69-81
- [12] 李培林. (1996).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社会学研究*, 4(50), 43-43
- [13] 李银河. (1995). *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 (Vol. 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4] 廖正宏. (1986). 光复后台湾农业政策的演变: 历史与社会的分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15] 齐心. (2007). 延续与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7(3), 74-79
- [16] 王春光. (2000).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 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社会学研究*, 3(1), 09-123
- [17] 吴惠芳, 饶静. (2010). 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重构行动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4), 81-88
- [18] 悦中山, 李树茁, 靳小怡. (2011). 从“先赋”到“后致”: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 31(6), 130-152.
- [19] 张文宏, 李沛良, 阮丹青. (2004).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 *社会学研究*, 6, 1-10
- [20] 张文宏. (2011).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 (上). *江海学刊*, 2, 104-112
- [21] 张文宏. (2011).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 (下). *江海学刊*, 3, 96-106

Mainland China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s During Their Mobility in Hong Kong

Chen Peier¹, Huang Xiaoxing²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ocial Policy,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2. School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ain how Mainland China residents working in Hong Kong with the duration of less than 7 years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during their mobility, focusing o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s within their flow-out and flow-in areas. Relying on peers, relatives and self-constructed networks, they initially try to establish a long-distance network in Hong Kong to disperse the information. However, with the breakdown of work and life,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ruct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s and maintain reg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ers sharing the common experience, and finally family relationship increasingly plays a vital role as compensation. As a result, the social network presents a loose and shrinking situation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mobility.

Key words: Mainland China residents; Hong Kong; Mobility; Social network

收稿日期 : 2018-12-14